

■ 探访非物质文化遗产

它是西域文化的独特符号，沿着丝绸之路，花开一路。它的发明，为丝绸之路增添了一抹文化之光，更为世界文化流传千载提供了珍贵的舞台。

桑皮纸：时光长河沉淀下的片羽

□ 本报记者 刘一颗
本报通讯员 刘中普

四月的阳光，虽不炙人，但也煦暖。从纸池子中捞出的桑皮纸，一张接一张“上墙”，不一会儿便被晒得“里外全干”。4月18日上午，曲阜市王庄镇纸坊村“千年纸坊文化部落”的东头，一面长长的北墙上铺满了桑皮纸，一家手工作坊的女主人正手脚麻利地从墙上揭纸。

相传，明朝时期，乔氏、郑氏两家由山西洪洞县同时迁入“安南庄”（即安难庄），并将桑皮纸工艺带入曲阜。为讨村民和睦相处，安居乐业的好彩头，村子更名“辛亥里”（即新安里）。随着桑皮纸工艺的发展，村中生产的纸张备受欢迎，并为孔府采用。于是，村子又更名为“纸坊村”，延续至今。明朝陈翰曾撰写一部孔氏家族志——《阙里志》，书中有记载：“纸坊在城北十里，居人造纸为业。”

丝绸之路上的明珠

“物象精华，乾坤微妙，古传今而华达夷，使后起合生，目授而心识之，承载者以何物哉？君与民通，师将弟命，凭藉咕咕口语，其与几何？”宋应星在《天工开物》中篇“杀青”一文中，直言短短一张文符或是半册课本，便能“终审论旨，风行而冰释焉”。

东汉蔡侯纸的出现，为载道之文提供了承载之物。受中原造纸技术的触动，西域地区开始因地制宜试验。特别是丝绸之路于阗古国的一些沙漠小村落，村人大胆尝试用特有的桑树皮制作纸张，制成西域最早的本土纸——西域桑皮纸，亦称于阗桑皮纸。

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，对“桑”字给出这样的解释：“蚕所食叶木。”《尔雅》写道：“桑，辨有葚，椹。”桑树可谓一身的“宝”：桑叶饲蚕，“蚕丝非常质，屈折成绮罗”；桑果为葚，“参差红紫熟方好，一缕清甜心底溶”；桑皮化纸，“春初斫繁枝，剥芽皮为上”。

桑树皮纤维韧长而结实，内皮有黏性，光滑细腻，易于加工。经砍条、剥皮、去杂、浸泡、灰桑皮、化瓢、送背头等72道工序，粗磨而成桑皮纸。桑皮纸纤维交错均匀，纹理美观，轻薄软绵，拉力强，不褪色，吸水性强，又防虫、防腐蚀。桑皮纸一经问世，便受到西域地区的认可，成为西域文化的独特符号。桑皮纸沿着丝绸之路，花开一路，向西传入欧洲。所经之地的居民，视丝绸和桑皮纸为丝绸之路的“明珠”。

中国纸张（含桑皮纸）的发明，推动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步伐。相传，桑皮纸承载了《突厥语大辞典》《福乐智慧》《一千零一夜》三本书的书写载体和手抄本原件。因当时印刷条件有限，文化巨著传承均靠手抄代代相传。据说，民间普遍流传的《古兰经》，大多也是靠手抄在桑皮纸



孔昭平正在“水里捞金” 刘一颗 摄

上才得以传播开来。这一小片纸张的发明，为丝绸之路增添了一抹文化之光，更为世界文化流传千载提供了珍贵的舞台。

水里捞金送背头

“身为竹骨与木皮，杀其青而白乃见，万卷百家基从此起。”杀青，将青色化为白色，把树木变为纸张。“脱胎换骨”的变化，是72道工序凝聚的结果，其中，“水里捞金送背头”最考验功力。

“你看，一推一拉，纸就出来了。”孔家第7代传人孔昭平站在玄坑中，一边捞纸，一边向记者介绍道：“看着出水时，只有一张纸，其实捞出纸、带出水，这一下有30斤重。”孔昭平是纸坊鲁明桑皮纸品牌注册人郑友明的妻子。

捞纸，是桑皮纸制作流程中“出成果”的环节，送背头是这一环节中“窍门之举”。帘子、帘床子、压帘棒子、担竿是捞纸必备工具。“干这门手艺这么多年，我们自己就能做这些工具。”郑友明接着说道：“从老一辈传下来，这些工具都有严格的尺寸。帘子77厘米长，40厘米宽，大多是南方产的细竹帘，很光滑，缝隙很细，能漏水又能留下纤维。后来，我们发现用平整的塑胶也能缝制成帘子。帘床子中间横隔几条细木条，且外框大小比帘子略大，用来支撑绷紧帘子。因为捞纸时，纸浆只靠帘子担不起来。还有一对压帘棒子，宽12厘

米，长50厘米，厚3厘米，分别压在帘子的左右两边，使帘子与帘床子紧贴在一起。这样，帘子在送背头时，最先插入纸浆的一边就不会被纸浆冲卷起来。”

为了展现送背头的“巧妙”，孔昭平特意放慢动作，“放大”每一个细节。捞纸前，先将帘子与帘床子对齐，放在帘床子上，再用压帘棒子将帘子压紧。然后，双手分别用拇指摁住压帘棒子，其他四指一起握紧帘床子，使帘子与帘床子紧贴在一起。随后，将合在一起的帘子与帘床子倾斜水平面45度，向纸池子斜插入水，插入约三分之一时暂停，再往上提起帘床子，这样前三分之一的帘子就会先被捞上纸浆，而仍在外面的三分之二未浸入池中，上面没有纸浆，这就是“送背头”。

送完背头，再往后（也就是往自己怀里）插入纸浆，使整个帘子与帘床子一起没入纸浆中，水平将帘床子端出。这样整个帘子上就会平铺一层纸浆，这一层平铺的桑皮纤维晾干后就是桑皮纸。因此前帘子的前三分之一处已经铺有一层纸浆，所以现在帘子的前三分之一处就会比后三分之二略厚，这三分之一就是背头，背头便于纸张的揭晒。

孔昭平右手边是纸池子，用来存放刚从帘子上卸下来的湿透的桑皮纸。“她每次转身下纸，迈一步。再转回身，迈一步。这一天，她在坑里捞纸12个小时，相当于走了15公里路。”郑友明感慨

道。“寒溪浸楮春夜月，敲冰举帘割脂。焙干坚滑若玉，一幅百钱曾不疑。”北宋诗人梅尧臣描绘了严冬时节一张纸诞生的艰难过程。其实，捞纸算得上是桑皮纸制作工艺的中后期环节，在此之前的制作环节也是相当费心费力。

一户桑皮纸有一户的味道

“附近种桑树的人太少了，现在主要从山西、湖北进原材料。”郑友明指着院中一捆捆桑树皮对记者说道，“我们顺着桑树，楮树皮的纤维往下剥，这样既容易剥，也能保护纤维，制作出来的桑皮纸柔韧性强。”

不远处有一座高高的白色炉子，烟囱正冒着烟。“那是在蒸桑皮。”据郑友明介绍，剥好的桑皮经过晾晒、去杂、捆扎后，被放入水中浸泡。泡软的桑皮被捞出后，再次入水，并被生石灰层层包裹，“桑皮捆要排列均匀严实，一池一般放七八百斤桑皮。在往灰池里放桑皮的时候，每放一层桑皮，就在上面撒一层生石灰。”生石灰遇水产生大量的热量，利用石灰水的温度及其化学性质将桑皮进一步软化，村民称把桑皮“烧熟”了，“熟了”的桑皮接着就要进“蒸锅”了。

千年传承下的桑皮纸制作工艺，对炉子的尺寸也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。炉子为半地下结构，用砖和水泥砌成，露出地面的部分高60—80厘米，地下部分约120厘米。远看就像一眼井，炉壁厚约35厘米，有火膛。炉子底部是一口铁锅，称“底锅”，直径110厘米。烟囱与锅相距250厘米左右，高300厘米。蒸桑皮时，先在底锅中盛满水，然后横跨底锅放两根木棍，再放入桑皮，木棍用来承担桑皮，因为桑皮是用水蒸汽蒸，所以桑皮不能掉进水里。蒸好的桑皮经过碾轧、化瓢、阴瓢、搓砸，被对折为长50厘米、宽12厘米、厚3厘米的多层饼子。饼子被放到长凳一样的切床上，将一圈绳子套在切床的桑皮瓢上，一脚踩住绳子，将桑皮饼固定，用双把的切床刀将桑皮饼切成2厘米左右宽的均匀的小段。切好的桑皮瓢“进入”棉布制成的大口袋里，每只口袋大约装40—50斤桑皮瓢，在河水中浸泡几个小时，并通过不断搅动、撞击，使桑皮瓢由原来的块状变成均匀的浆状。

从河中出水的纸浆被倒入纸池子，“一次倒入两袋瓢，每袋约50斤”。加瓢后在池中用小竹竿由左向右用力划水面，发出“嗡嗡”响声，使桑皮纤维尽可能地松散均匀。“打匀两袋纸浆，需要40分钟，打1500—2000下，胳膊累得都抬不起来。”郑友明等艺人发现，搅拌过程中水面时常会出现泡沫，造成纸张有孔，“滴几滴炒菜用的油，泡沫就没了”。盈满纸浆的纸池子，静静地等待着艺人，“水里”捞金。

“千年纸坊文化部落”共有20多家手工作坊，每家产出的桑皮纸也各有不同。“72道工序，全部



桑皮纸糊成的酒篓 刘一颗 摄

手工操作，一家纸有一家的样子和味道。”王庄镇文化站站孔祥雷说道。

上等酒器的保护伞

“其精在此，而其粗在于障风、护物之间。”不少书画家喜选桑皮纸挥毫泼墨，其天然的纤维纹理为作品增加了质朴的味道。桑皮纸还有一个重要用途，制作酒容器。据孔祥雷讲解，“酒海”作为原浆酒的容器，有着近千年的历史。“用荆条编成大篓，内壁以血料、石灰等作为粘合剂糊上百层桑皮纸，后用蛋清、蜂蜜、熟菜籽油等以一定比例涂擦、晾干而成，每个可储酒5—6吨。这种闪耀着先民们勤劳智慧的贮酒容器，被称为‘大海’。这一特殊的制作工艺，使酒海呈现出一个神奇的现象：‘装酒滴酒不漏，装水挥发殆尽’。酒海存量大，酒耗小，又利于酒的熟化，适于长期贮存，是世界酿酒行业传统储体最大的容器。”

“越来越多的酒厂来我们这里定桑皮纸包裹的酒篓，酒海，每年销售额约有200万元。”曲阜市仁泰容器包装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勇告诉记者，桑皮纸多被用于制作酒容器，“将猪血与生石灰调制为黏合剂，将桑皮纸裁成适宜大小，一层层贴进枝条做成的酒篓，晒干后，酒篓便是滴酒不漏的上等酒容器”。

午后两点多钟，近百个包有桑皮纸的酒篓被整齐地摆放在门口，沐浴着阳光，等候检阅。室内，几位糊纸艺人正一丝不苟地贴纸，记者一行人的到来并未影响他们手中的工作，头也不曾抬起，完全沉浸在工作的世界里。

67岁的孔繁弟是一名传统“糊匠”，16岁时，就习得桑皮纸糊容器的技艺。“根据酒篓的大小、面积，把桑皮纸裁成大小不一的纸片。贴纸是从底往上，重合一指的宽度。”50多年的从业经验，令孔繁弟对“黏合剂”的制作也颇有心得：“100斤的猪血配30斤的生石灰，调出的黏度刚刚好。这些黏合剂能糊成100多个小酒篓，若是5吨容量的酒海，也就只能糊4层吧。”孔繁弟对黏合剂呛鼻的血腥气也习以为常：“对身体没伤害，所以不觉得难受。”

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。作为桑皮纸的产地之一，王庄镇各种规模的酒容器公司遍地开花。桑皮纸生产和酒篓酒海制作技艺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在这里一直传承着发展着。

■ 烽火八年 山河壮歌·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

情报站出了叛徒，日军两天把情报站包围了三次。当时，他就在站里。房东老太太和一个小姑娘听到鬼子来了，

赶紧把他藏起来。鬼子让她们交人，她们死活不交……

孙成臻：“为了救我，她们牺牲了……”

□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梁金凤
本报通讯员 魏坚强

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，除了在前线奋勇杀敌的战士，还有一群在敌后默默工作的地下无名英雄。他们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，深入敌后搜集情报，冒着生命危险传递信息……平度市东阁街道86岁的孙成臻，就是这样一位默默做着敌后情报工作的抗战老兵。清明节前夕，孙成臻老人在平度家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

12岁参加革命的情报员

1938年，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年，日军入侵平度，并实行了惨无人道的“三光”政策，先后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。

1931年8月出生的孙成臻，就在这样的残酷环境中成长，目睹了无恶不作的日军烧杀抢掠。

孙成臻所在的旧店镇涧里村是山区，那里是八路军的根据地。“那个时候，八路军的兵工厂就在我们村里。1942年，日本鬼子总是来扫荡，兵工厂就搬走了。其实，日本鬼子不敢轻易进村，他们知道，进村的话很有可能出不去，那个地方周围都是山，只有往东有个平原，那是八路军活动的根据地。”孙成臻说。

孙成臻的大哥1938年参军，做侦察工作，受伤复原回到村子里后，他们就一起照顾村里根据地的伤病员。“当时，我们家里就住着伤病员。”受家庭的影响，幼年的孙成臻对共产党、八路军有着发自内心的亲切。

1943年，年仅12岁的孙成臻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工作。他从心底里相信共产党，坚信共产党会取得胜利。“是共产党把我救出来，我12岁出来，什么都不懂，一直在党的培养下长大。”

进入情报站工作也是机缘巧合。“当时的情报站长就住在我们村，他看我机灵，很喜欢我，我就是跟着他出来的。”投身革命，孙成臻就从事着危险系数相当高的情报工作，“情报工作比打仗都难，因为情报工作是在敌人内部进行的。”尽管深知工作艰险，孙成臻也从未犹豫后悔过。

乔装打扮打探情报

当时，日本鬼子到处“扫荡”，给根据地带来极大的威胁。为了获取日军的各种情报，孙成臻和其他情报工作人员经常乔装打扮成不同身份的人，深入到日军据点收集信息。

孙成臻回忆说，伪装非常重要，不能被识破。当时他们最常扮的就是乞丐和卖瓜的农民。为了更方便接近敌人，孙成臻经常穿得破破烂烂，挎着篮子，装成乞丐，去据点附近要饭、搭话。有时，孙成臻也挑着担子，扮成瓜农，到日军据点旁边卖瓜。“到日本鬼子据点去卖瓜，目的是去调查情况，他们愿意给钱就给几个，不给拉倒。进去以后，他们在那吃瓜，没人管我了，我就悄悄进去摸摸摸摸大炮之类的有几门，在什么地方，查查这个据点有多少鬼子，大概有多少枪，统统记在心里。那时候在情报站经常干这个。”

1944年，八路军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在南村设立情报站，孙成臻负责侦察、传递青岛一带的情报工作。当时，南村一共设立了两个车子铺作为情报站点，传递情报的同志们来到这里，孙成臻就负责把他们安排到不同的地方去。按照规定，两条线的情报人员是不能够见面的。“是一个人来安排一个地方，另外一个来了我再安排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他们是不能见面的，就是两条线，干什么都得单独联系。”

除了南村的两个情报站之外，在平度城还有一个情报站点。孙成臻每天都要往返平度城和南村，拿到情报后送出去。一天下午，他将所有的情况进行汇总、整理，并统一向南海军分区情报站进行汇报。

面对凶残的敌人和险恶的环境，年少的孙成臻有时也害怕。那个时候，送情报的秘密工作总是晚上进行。孙成臻回忆，从莘庄到南村，路过莱西，在必经之路上有一片树林，土匪经常在这里杀人抛尸。每次晚上路过这里，十三四岁的孙成臻都胆战心惊。“不下雨的时候还好，月亮还能照点明，打雷下雨的时候漆黑一片，路都看不清，特别吓人。说不害怕是假的，但是完不成任务不行啊。这个工作如果你害怕，完不成，那你就干不了情报工作。所以我一直坚持干，知道很危险，要是碰上土



年轻时的孙成臻



孙成臻近照

匪、日本鬼子就坏了。不过，那时候的老百姓特别好，晚上找不到路了，把老百姓叫起来问路，不管是谁都会告诉你，老百姓对日本鬼子恨得要命。”

遭遇叛徒死里逃生

在情报站工作，危机四伏，惊险的事情时有发生。孙成臻回忆：“在另一个情报站，有一个同志也是化装成卖瓜的农民去鬼子据点搜集情报，不幸被日本鬼子发现。鬼子把他抓起来，送到了高密，直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，才把他放回来。”

化装执行任务没有被识破过，孙成臻却因叛徒出卖而面临死亡威胁。那是1943年在莱西莘庄的时候，情报站有人叛变，同志们身处危险之中。“因为叛徒告密，日本鬼子两天把情报站包围了三次。他们疯狂地抓捕，情报站的十几个同志只剩下几个人了。其实，鬼子包围情报站的时候，我就在情报站里。房东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姑娘，她们听到鬼子来了，赶紧把我藏了起来。鬼子让她们交人，她们怎么也不交，最后日本鬼子把她们两个都打死了。”事情过去几十年，但说到这儿，老人还是情绪激动，泪流满面。想到牺牲的战友和老

乡，孙成臻老人哽咽着说：“这种痛苦的经历，我都不敢说也不愿说，为了救我，她们都牺牲了，我是死里逃生。”

艰苦的战斗环境中，意志不坚定的人叛变时有发生。孙成臻老人回忆：“1943年夏天，那个带我出来的情报站长也被叛徒出卖了，全家七口人都被打死了。”孙成臻坦言，当时他也不知道八路军与敌人打多久，“日本鬼子很凶恶狡诈，但是他们也害怕我们的侦察工作。我只知道党怎么分配，我就怎么干活。我12岁出来当兵，共产党把我养大，我就靠着共产党，听共产党的话。”

手榴弹在身旁炸响

干情报工作要求非常严，“从青岛送来的情报，都是白色手纸，你不用水洗不出来，得把情报放水里才能看出来写的是什么。这样是为了保密，防止被敌人发现。万一被敌人截获也不打紧。”

1942年到1944年，孙成臻就这样往返于兰底、南村、郭庄一带传递情报。1944年，孙成臻去了大玉湾情报站。1945年，他主要往返于青岛、崂山、兰村、平度、即墨等地，了解敌人活动情况。

谈到抗战期间传递情报的经验，孙成臻说：“没有什么绝招，就是不该死的死不了。1945年，日本鬼子投降，我在公路上抓了两个特务，情报站站长就在那里审特务，十多个人在情报站里。当时忘了手榴弹的线在外面，有人不小心拔下了手榴弹的盖子，手榴弹炸开了。两个特务的脑袋被打破了，情报站的人一个受伤的都没有。那个手榴弹就在我旁边响的，但是我一点伤也没受。这样的事很少，可能是我命大。”

1947年，孙成臻被调到南海军分区侦察连，继续负责敌后情报工作，侦察青岛周围敌人的情况。1948年2月，17岁的孙成臻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随后，他随部队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。在战斗中英勇作战，孙成臻荣获二等功一次，三等功三次，四等功四次。

“当时我在大玉湾情报站是第一名，在南海情报站我也是第一名。”孙成臻自豪地说。

1958年，由于身患疾病，孙成臻转业至铁路系统工作，时任东方红车站站长。1964年，中央要调孙成臻到新疆，最终他却回到了山东。“当时跟我在一起的另外一个书记调到了山东，我家里还有老人，后来他就跟我说，你回山东吧，我去新疆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换了，我回了山东。”调回山东麻兰，孙成臻先后在麻兰、古岵等地从事基层工作，直到离休。如今，孙成臻家庭和睦，儿孙孝顺，生活怡然自得。

附记：平度市委老干部局的工作人员介绍，1938年至1945年9月，日本侵略者侵占平度城，残酷迫害平度百姓，制造了公婆楼惨案、杨家惨案等多起惨案。与全国一样，平度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不屈不挠，奋起反抗，从共产党员郭士先组建第一支平度抗日游击队，到乔天华、罗竹凤、刘文卿等成立平度抗日救国会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。特别是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地雷战，为整个胶东军民的抗战提供了宝贵经验。抗战期间，平度党组织领导县大队、独立营及广大民兵对敌作战2700多次，歼敌2万余人。

采访中，平度市委老干部局的工作人员将一本《手印：咱们的抗战老兵》赠给了记者。这本书中，记录着200多位平度抗战老兵的英雄事迹，以抗战亲历者的口述为主，辅以人物档案和老照片、老物件，以镜头语言去记录他们现在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。据悉，为深入挖掘抗战历史，传承红色基因，平度市委老干部局联合有关部门，对抗战时期的老党员和复员退伍军人一并采访，共计入户采访1000多人次，拍摄照片5700多幅，摄像累计10000多分钟，采集手印300多张，收集老物件、老照片100多件，其中，抗战故事71篇，人物简介134篇，全景式地记录了当年这些普通抗战老兵的故事，揭示了抗战老兵的奉献、牺牲、爱党、爱国的情怀，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党史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教材。